

WRITING ON THE WALL

Disappeared Booksellers and
Free Expression in Hong Kong

銅鑼灣書店事件與香港出版自由狀況

五名香港書店職員在2015年下旬突然消失，引來香港文學界、國際出版業、維權人士以至外交圈子一陣騷動。不論是商家、記者、作家還是外交使節，都一直視香港為一個立足於紛亂迭起和政治打壓環境的自由開放之都。1997年，香港由英國殖民地回歸中國管治，當時收回主權的一方承諾將在此以「一國兩制」的方式維持香港開放的商業、知性和文化特色。這一切自由和香港的自治權都受1997年開始生效的《基本法》明文保障。香港作為進出中國的大門，是一個讓人才、思想、書籍、電影以至生意往來的中轉站，使中國與世界接軌，亦讓中國人民有機會接觸一些在這個受嚴密監控的國度下無法體會的事物。《基本法》和政府制度本應為香港居民提供一道安全網，但這道安全網近年卻不免隨着北京越益緊控香港的媒體及管治而裂縫處處。

種種跡象顯示中國政府強行綁架五名售賣煽情政治書籍的華裔書商，並在香港、中國大陸以至泰國（桂民海）捉拿他們，侵蝕香港一直享有的安全環境。PEN America的 *Writing on the Wall: Disappeared Booksellers and Free Expression in Hong Kong* 提出，五名書店員工的消失清楚顯示中國的國安長臂絕對可以、甚至不惜延伸向香港以至其他地方。詳情曖昧不明，刑事提訴未見，這幾名書店員工售賣的書籍縱在描繪中國領導人的種種時直言不諱，但買書賣書只屬正常不過的商業活動，竟會為售書人招來如此待遇，實不免為書籍出版界帶來一陣寒蟬效應。事件的疑團和不明朗因素令人時刻懷疑甚至提心吊膽，到底作家、出版商和書商因有何行為才帶來切身危險，大大窒礙香港種種思潮的流通。事情的發展亦使他國的出版及傳媒從業員猶豫，到底他們能否繼續一如既往信賴香港，而他們駐紮此地以求亞洲業務穩定發展又是否依然穩妥。

從PEN America在報告中羅列書店事件的各個層面都顯示，中國當局以推陳出新的方式打擊異己，控制輿論，在境內以至境外都為求目的不擇手段。粗糙的強迫認罪手法似乎非為說服境內外民眾這些書商罪有應得，而只為編造疑點損害他們的名聲，在有意為其聲討的人面前質疑這些書

商的主張和要求，轉移國際社會的視線。中國當局在這些強制認罪中往往加入認罪者否認與外國有國民身份聯繫的環節，為可能希望迴避紛爭的外國政府提供下台階。從當局對待原籍中國的英國國民李波和瑞典國民桂民海可見，中國操控早已逃出國境或移居外地的華裔人士有其一套方法。中國毋須使用合法的引渡條例或法律程序，只需使用其國安手段，已可在外地不經保護程序拘捕華裔人士，並向外國政府施壓使其對事件視而不見，甚至提供協助。

書店員工失蹤事件引來國際哄動後，五名被捕者中有四名獲釋，但只有其中一人——林榮基願意公開其經歷，其他三人皆選擇保持沉默。至於剩下的一人，亦即瑞典國民桂民海，則繼續被羈留而無法與外界溝通。中國決定釋放大部分被捕者的其中一個原因或許源自國際上的輿論壓力，另外各國亦可能因應地緣政治的利益關係而加強了外交斡旋，使各人得以獲釋。而當桂民海仍被扣押的同時，另一名同樣受中國政治囚禁的瑞典籍維權人士彼得·達林（Peter Dahlin）卻迅速獲釋，亦令人不禁懷疑到底在這些人權個案中，種族和國籍佔有一個怎樣的席位。

中國異見人士不容於國內，人所共知。中國人民對批判政府、獨立思考和挑戰官方輿論等都十分警覺，明知宣之於口將帶來人身危險。但尤其對華裔人士來說，遠離中國國境以策安全的選擇亦似乎變得不再可靠。異見人士、維權人士，以至他們的盟友都必須覺察中國為求懲罰和阻止來自國外的批評，益發不惜侵犯主權和法理以達目的。外國政府應以堅定立場回應中國當局強迫認罪和以種族定奪對待方式的政治手段，鞏固國際輿論並使他國政府更有力為其國民爭取權益。中國在地緣政治上的重要性及其與亞洲和世界各國深厚的雙邊關係，無疑可令外國政府在考慮批評中國當局時卻步，以免觸怒北京；但書店事件明確顯示，面對國際輿論的鞭撻，北京亦非無法撼動，而且確知其行為將在何地受何人批判。

書店事件提醒所有與中國有來往的人，必須睜開雙眼看清楚北京的目的和手段，在中國當局嘗試動搖國際體系和普世價值及標準時，堅守立場。